

论 14 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李化成

内容提要 黑死病在 14 世纪的英国流行期间,既有遍及全国的普遍性,又体现出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流行特点与当时英国的聚落环境密切相关。其中,聚落空间环境为鼠、蚤、人的紧密共存创造了条件,聚落社会环境则使得瘟疫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这两者还相互联系,依据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对瘟疫的传播形成影响。但无论是聚落空间环境,还是聚落社会环境,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创造的一种生存和生活环境,因此瘟疫可以依托聚落环境而肆虐,亦可随着聚落环境的改变而受到控制。在这背后,则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 英国 聚落环境 黑死病 瘟疫

1348—1350 年,黑死病传播到英国并大规模爆发,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这场瘟疫遍布全国,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黑死病的肆虐也存在着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那么,黑死病为什么可以在英国肆虐,其传播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又缘何而生? 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史学界的重视。自 19 世纪中期始,随着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发端与深入,史学界始对黑死病多有关注。例如,著名史学家西博姆、罗杰斯、杰索普和格林等人围绕农奴制、教会变迁等问题,对黑死病的社会影响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①直至今日,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界,对黑死病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一直占有主流地位。^②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在一种社会长期发展的视野中,对黑死病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论述。问题在于,倘若忽视对上述瘟疫肆虐问题的研究,我们便难以还原瘟疫时期真实图景,亦难以把黑死病与整个英国的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瘟疫与社会(1348—1530)”(项目批号 08CSS003)的中期成果。

- ① F. 西博姆《黑死病及其在英国史中的地位》(F. Seebohm, “The Black Death and Its Place in English History”),《黑死病及其在英国史中的地位》(续 (“The Black Death and Its Place in English History, Part II”),《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 第 2 卷,1865 年,第 149—160、269—279 页;T. 罗杰斯《黑死病前后的英格兰》(E. T. Rogers, ‘England before and after the Black Death’),《双周评论》第 3 卷,1865 年 10 月,第 191—196 页;奥古斯塔斯·杰塞普《东英格兰的黑死病》(Augustus Jessopp, “The Black Death in East Anglia”),《十九世纪:每月评论》(Nineteenth Century: A Monthly Review) 第 16 卷,1884 年 10 月,第 915—934 页;J. R. 格林《英国人民简史》(J. R. 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第 1 卷,纽约 1898 年版,第 306、317 页。
- ② 代表性的著作如约翰·哈彻尔《瘟疫、人口和英国经济(1348—1350 年)》(J. Hatcher *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350*) 伦敦 1977 年版;L. R. 普斯《黑死病后的乡村社会:埃塞克斯,1350—1525 年》(L. R. Poos *A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Essex 1350—1520*)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科林·普拉特《国王之死:中世纪晚期英国的黑死病及其后果》(Colin Platt *King Death: The Black Death and Its Aftermath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伦敦 1996 年版。

医史学家们倒是黑死病传播问题有所关注。例如,1891年,克莱顿在其名作《从664年到瘟疫消失的英国流行病史》中,对英国黑死病的蔓延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由于他不了解黑死病的病因和流行病学,因此只能给出一些颇为牵强的推论。例如,他认为人与人的接触并不能导致黑死病的大规模爆发,这一瘟疫的传播主要是因为染病者的尸体腐蚀土壤环境引起的。^①但克莱顿却揭示了环境因素在瘟疫流传中的重要性,没有适宜的环境,任何传染病的传播和蔓延都无从实现。然而,其后的医史学家们在黑死病的研究中,尽管也对瘟疫传播的环境给予一定的重视,但由于对病因的片面理解,抑或对证据的片面掌握,都存在着较多的不足,或关注因素不足,或太过于笼统,不能充分说明瘟疫爆发与14世纪英国环境之间的关系。^②笔者认为,在对黑死病的流行进行环境史研究时,必须首先紧密结合其流行病学对相关环境因素加以仔细分类和界定,方可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近年来,通过医学考古和分子生物学的检测,黑死病的罪魁祸首几乎可以肯定为鼠疫。^③本文对该瘟疫的考察,也是基于黑死病即鼠疫这一结论展开的。鼠疫的传播主要有三种途径,即“鼠→蚤→人”、“人→蚤→人”、“人→人”三种。无论是蚤类,还是其主要宿主黑鼠,都不是喜好迁徙的动物,活动范围有限。^④故而,不管对哪一种传播途径来说,只有鼠、蚤与人以及人与人密切接触,黑死病的传播才有可能,而这种密切接触需要适宜的区域环境。对于中世纪英国来说,这种区域环境主要体现为一种聚落环境。聚落,是指按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居民集聚定居的地点”,一般分为城市、集镇、村庄等。^⑤而聚落环境,则指经由人与环境的互动而形成的聚落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本文拟对14世纪英国的聚落的空间、社会环境与黑死病传播的关系问题加以考察,探究瘟疫流传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原因,并以此揭示社会发展中人类在与病原体博弈中争取主动性的努力。

-
- ① 查尔斯·克莱顿《从664年到瘟疫消失的英国流行病史》(Charles Creighton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from A. 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剑桥大学出版社1891年版,第175—176页。
 - ② 如施鲁斯伯里在论述影响黑死病传播的因素时,注意到了人居环境以及远距离交往环境。然而,在对黑死病病因的解释上,他太过于武断,将黑死病主要界定为腺鼠疫,忽视了其他类型鼠疫的传播作用。此外,他对作为人口主要聚集区的乡村地区重视不足。而贝内迪克托则注意到了黑死病多病因的可能性,且将瘟疫的传播周期、死亡率与环境密切地结合了起来。但遗憾的是,这种结合所依据的资料,却是近代印度等地鼠疫流行的资料,故而其结论只能是一种推断。他把可考虑的因素都列举出来,但太过于笼统,且彼此抵牾之处甚多。J. F. D. 施鲁斯伯里《英伦诸岛的腺鼠疫史》(J. F. D. Shrewsbury *A History of Bubonic Plague in the British Isl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36页。O. J. 贝内迪克托:《黑死病完整史(1346—1353)》(Ole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萨福克2004年版,第356页。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李娜、解建红《中世纪后期英国黑死病爆发原因新议——环境史视野下的中世纪后期英国黑死病》,《学海》2008年第1期。
 - ③ 最近的,也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可参考斯蒂凡妮·亨施等《耶尔森氏菌的不同菌株造成了黑死病》(Stephanie Haensch *et al.*, “Distinct Clones of *Yersinia pestis* Caused the Black Death”),《科学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第6卷,2010年10月第10期,第1—8页。
 - ④ 据研究,作为鼠疫主要传播媒介之一的印鼠客蚤对活鼠的攻击距离中位数为3.79厘米,最大攻击距离为15厘米,对死鼠攻击距离中位数为2.56厘米;最大攻击距离为9厘米;而黑鼠在其存活的2年左右时间里,依靠自己迁徙最大距离仅为200米。孙晨熹《蚤类及其防治》,《医学动物防制》2005年第3期;迈克尔·麦考密克《老鼠、交通和瘟疫:一项生态史的研究》(Michael McCormick, “Rats, Communications and Plague: Toward an Ecological History”),《跨学科史学研究》(*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34卷,2003年第1期。
 - ⑤ 《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中世纪英国的聚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乡村,聚落体现为一个庄园或乡镇;城市、大城市包括多个围绕不同街道、教堂、修道院等而形成的小聚落,并且这些小聚落还彼此联系,使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大聚落;而数量众多的小城市或集镇,本身即是一个聚落。

一、聚落空间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在鼠疫的传播中,黑鼠的作用明显。黑鼠是一种家栖性动物,广泛存在于黑死病时期的英国。施鲁斯伯里发现,“有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家鼠在英格兰的适时存在,使得在 14 世纪肆虐全国的腺鼠疫这种大流行病得以维持”^①。不过,如果人类的居所以石头为原材料,内有坚顶,外有高墙或城壕,黑鼠恐难轻松侵入;如果是砖砌房屋,辅以石顶或瓦片,也可以起到防鼠的效果。施鲁斯伯里甚至认为,这种砖砌住所的推广,是黑鼠从英国大部分地区最终消失的重要因素。^②然而黑死病爆发前,这两种建筑都不多见。在城镇,主要的建材为木料,即使到了 1500 年左右,也是以茅草或木瓦盖住屋顶,窗户也是木质的。^③乡村亦是如此。在绝大多数小房子和茅屋的结构中,屋顶主梁都由弯曲的大橡木组成,起于地面,顺着边墙,与横梁之处交会;屋架搭成之后,则用“草泥、泥土和泥浆”筑墙;屋顶更为简单,主要材料为茅草、麦秸、莎草、芦苇等。^④这种居住环境,显然难以阻挡老鼠与人的“亲密接触”。亲历过黑死病的乔叟曾提到有人买毒药,借口便是灭鼠。^⑤以上环境同样是蚤类生存的乐园。英国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区,终年湿润多雨,湿度高,从整体气候环境来说就利于蚤类的生长。^⑥加之,中世纪室内多有适于蚤类巢居的谷物堆放,且人、畜、禽混杂,卫生条件甚为糟糕,使得蚤类极其活跃。^⑦在 15 世纪,英国医生库特松就曾猜测,害虫在瘟疫发生时可能起到了作用。^⑧在英国的近邻法国,则有医生提到了杀虫药和驱鼠剂的运用。^⑨与此同时,中世纪人在单栋建筑内聚集度很高,如在伦敦,很多人蜗居在 15 英尺见方的小房子里;小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⑩这使得病菌一旦传入,亦可经由“人→人”的途径迅速流传。

由上可见,在中世纪英国的聚落空间环境中,鼠、蚤、人的紧密共存,便于鼠疫的发作和流传。在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下,不同聚落之间的空间也有不同,从而导致瘟疫肆虐的差异。一般认为,城市居民的死亡率要高于乡村。例如,坎特伯雷的税册显示,瘟疫后 2/3 的纳税人消失了,莱斯特的人口也减少了一半。这种城市人口的高死亡率使得牛津等地市民向乡村逃离。^⑪城市情况的严重,盖

① J. F. D. 施鲁斯伯里《英伦诸岛的腺鼠疫史》,第 13 页。

② J. F. D. 施鲁斯伯里《英伦诸岛的腺鼠疫史》,第 35 页。

③ 比尔·里斯贝罗著,陈健译《西方建筑:从远古到现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4 页。

④ 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著,龙秀清等译《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 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8—200 页。

⑤ 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Geoffrey Chaucer, *Canterbury Tales*),伦敦 1854 年版,第 345—346 页。

⑥ 乔治·W. 霍夫曼主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山东大学编译室合译,《欧洲地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9 页;曾尊园《英国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50 页。

⑦ J. F. D. 施鲁斯伯里《英伦诸岛的腺鼠疫史》,第 35—36 页。

⑧ R. S. 戈特弗里德《十五世纪英格兰的传染病》(R. S. Gottfried, *Epidemic Disease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Medieval Response and Its Demographic Consequence*),莱斯特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66 页。

⑨ C. N. 法布里《中世纪瘟疫医学的传承与变革:基于 1348 年到 1599 年 152 份瘟疫手册的研究》(C. N. Fabbri,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Plague Medicine: A Survey of 152 Plague Tracts from 1348 to 1599*),耶鲁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6 年,UMI 编号:3214261,第 150 页。

⑩ 克里斯托弗·戴尔《在中世纪谋生:850 到 1520 年的不列颠人民》(Christopher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 850 - 1520*),伦敦 2003 年版,第 199 页。

⑪ 理查德·布里特纳尔《英国城市的黑死病》(Richard Britnell, "The Black Death in English Towns"),《城市历史》(*Urban History*) 第 21 卷,1994 年第 2 期,第 200、202 页。

因其空间环境更有利于黑死病的传播。因为人口密度大,城市的卫生条件更为恶劣。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牲畜和人都住得很近;人们还习惯于往路上、河道和沟渠中抛洒各种垃圾。^①垃圾,尤其是有机垃圾,是老鼠等食腐动物重要的能量来源之一。研究表明,在中世纪,有机垃圾足以使食腐种群保持高密度,而老鼠正是主要的食腐动物之一。^②另外,城市建筑密集,研究表明,“城市是曲折狭隘的街道、死胡同和庭院组成的迷宫;广场很小,远离街道,几乎没有宽阔的街景或建筑物”^③。这就更为鼠、蚤、人的密切接触和鼠疫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伦敦等城市即可为例。

14世纪的伦敦已是英国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房屋密集,空间狭小,却居住着大约8万甚至10万人^④。众多的人口栖息在狭小的街区中,卫生条件极其糟糕。正如霍莱斯特所说,“用今天的标准衡量,那时的伦敦城狭小、肮脏,是一个臭气熏天的、易于发生火灾的废物堆”^⑤。这种环境无疑易于老鼠和跳蚤的生存,从而使得瘟疫到来的时候宾至如归。“瘟疫大概在万圣节(1348年11月1日——译者注)传到了伦敦,此后每天都夺走许多人的生命。”^⑥在1346—1348年,伦敦地方法庭平均每年认证的遗嘱大概有22件。^⑦但是1349年1月所认证的遗嘱数量就达到了19件,几乎相当于之前一年审理的总量,4月更是狂增到82件。^⑧据阿维斯伯里的罗伯特记载,“从1349年的圣烛节(2月2日——译者注)到复活节(4月12日——译者注),瘟疫变得愈加猖狂,每天都有超过200具尸体被埋葬”^⑨。按照这个比例,在整个瘟疫期间伦敦总的死亡人数应该不低于51,000人,占伦敦总人口的一半还要多。^⑩在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里奇,瘟疫也夺去了至少一半的人口^⑪。较小的城市也不能幸免,在贝里圣埃德蒙兹,黑死病前约有7000人,到了1377年进行人头税统计的时候,仅有4200人,估计在黑死病期间下降了40%^⑫。

即使在同一聚落内,不同的人群因为居住环境不同,也会体现出死亡率的差异。如以教俗大贵

-
- ① 理查德·布里特纳尔《城市生活》(Richard Britnell, "Town Life"),罗斯玛丽·霍罗克斯、马克·阿莫诺主编《英国社会史(1200—1500)》(Rosemary Horrox and W. Mark Ormrod, ed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200 - 1500*),剑桥2006年版,第135页。
- ② T. P. 奥康纳《人类废弃物是中世纪市镇中脊椎动物群落生存的主要生态因素之一》(T. P. O'Connor, "Human Refuse as a Major Ecological Factor in Medieval Urban Vertebrate Communities"),杰夫·贝利、鲁斯·查尔斯、尼克·温德尔主编《人类生态动力学:环境考古学学会1998年纽卡斯尔研讨会论文集》(Geoff Bailey, Ruth Charles, Nick Winder, eds., *Human Ecodynamics: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Conference 1998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0页。
- ③ 多米尼克·巴泰勒米、菲利普·孔塔米内《农民壁炉到教皇宫殿:14—16世纪》,菲利普·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90页。
- ④ R. M. 史密斯《英格兰乡村的人口发展调查(1300—1348年)》(R. M. Smith,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Rural England, 1300 - 1348: A Survey"),布鲁斯·坎贝尔主编《黑死病之前:十四世纪早期危机研究》(Bruce Campbell, ed., *Before the Black Death: Studies in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
- ⑤ C. 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1页。
- ⑥ 阿维斯伯里的罗伯特《瘟疫流传到伦敦》(Robert of Avesbury, "The Plague Spreads to London"),罗斯玛丽·霍罗克斯《黑死病》(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5页。
- ⑦ O. J. 贝内迪克托《黑死病完整史(1346—1353)》,第136—137页。
- ⑧ O. J. 贝内迪克托《黑死病完整史(1346—1353)》,第137页。
- ⑨ 阿维斯伯里的罗伯特《瘟疫流传到伦敦》,第65页。
- ⑩ 菲利普·齐格勒《黑死病》(Philip Ziegler, *The Black Death*),伦敦1969年版,第158页。
- ⑪ 菲利普·齐格勒《黑死病》,第170页。
- ⑫ R. S. 戈特弗里德《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的自然和人类灾难》(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族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主要居住在城堡之中,建筑牢固,且相对独立。“城堡的外墙成了强有力的防御线,城堡的主楼(起居室)被一间巨大而又坚固的门房取而代之,地处城堡前方险要地位。外墙永远都设有峭壁和险沟防护,而且城堡四周经常有一圈矮矮的马刺墙,可以把进攻者远远地阻拦在城堡地基之外。”^①这种建筑较容易阻止老鼠和患病者的进入。另外,权贵阶层大多还有其私人的礼拜堂或祈祷室。^②故而有编年史中写道,黑死病“到处攻击庄园居民和普通人,却很少袭击权贵”^③。事实上,社会上层在黑死病期间的死亡率也是最低的。哈彻尔对总佃户死后财产调查(Inquisitions Post Mortem)的统计表明,1348年在505个拥有遗产的总佃户中,138人死于瘟疫,死亡率仅约为27%^④。

二、聚落社会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如布里特纳尔所说,在中世纪的英国,聚落不仅是人类因地理、遗传等因素自然聚集的生存单位,而且是一个与十户联保制、庄园法庭等联合在一起的政治单位,以及有小规模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单位。^⑤瘟疫的流传不仅与聚落空间环境有关,而且与这种环境中人与人的交往有关。通过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人们不断将瘟疫彼此传播,这就构成了瘟疫传播的聚落社会环境。这些社会交往种类很多。人们因谋生展开各种劳动、商贸交往。例如,在乡村,农民需要参加许多公共性、协作性的劳动,特别是抵充劳役地租的劳动。^⑥此外,他们还会随机做苦力、帮工或工匠等工作,从而与他人交往接触;而一些村民如小佃农、修补匠等,本身的工作就具有流动性。而农民还要每周一次赶往当地的市场出卖农产品以得到现金用于支付租金、罚款和各种税项。^⑦除此之外,邻里之间,地主和佃农之间,村民和商贩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常规贸易。^⑧人们在十户联保制等纽带的连接下,成为一个聚落性政治交往的单位,所以他们还会为各种公共性事务进行公务交往。例如,村民往往参加频繁召开庄园法庭,维持日常治安,履行集体义务;而城乡居民则频频参加各种集体性的宗教活动,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中世纪的英格兰被称为“快乐的英格兰”(Merrie England),可见,当时的英国人并非终日操劳,而是多有休闲,并且这些休闲活动一般是集体参与的。据统计,中世纪英国可

① 比尔·里斯贝罗《西方建筑:从远古到现代》第100页。

② 戴维·勒平《英格兰:教会和僧侣》(David Levine, "England: Church and Clergy") S. H. 里格比主编《中世纪晚期英国指南》(S. H. Rigby ed. *A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③ O. J. 贝内迪克托《黑死病完整史(1346—1353)》第349页。

④ 约翰·哈彻尔《瘟疫、人口与英国经济(1348—1530年)》(John Hatcher *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页。

⑤ 理查德·布里特纳尔《英国社会的商业化(1000—1500年)》(Richard H. Britnell,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000—1500*)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⑥ 这种劳役数量较多,一般是每周三天,此外还有繁忙季节的帮忙,而这些劳役往往是由农民集体完成,如组成犁队共同犁地,为领主运送货物等。马克森《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207页;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第33、38、85、88、113页。

⑦ 马克·贝利《英格兰的农民福利(1290—1348年)》(Mark Bailey, *Peasant Welfare in England, 1290—1348*) ,《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第51卷,1998年第2期,第233页。

⑧ 理查德·布里特纳尔《英国社会的商业化(1000—1500年)》第6、97—101页。

供休闲的非工作日(或宗教节日)一年加起来竟然达到了115天^①。这种聚落社会环境甚至在瘟疫发生之后都未有实质性的改变。例如根据罗博对温彻斯特主教区的卷档(the Pipe Rolls)的分析可知,无论在领地之上还是城堡之中,包括收割、建筑等在内的各类工作在黑死病期间一如既往,只是工资提高了。市场亦未歇业,一位名叫罗尼维的领主依然在市场上卖了2头奶牛、23头犊牛、7只阉羊和15只绵羊。法勒姆的百户区法庭也照常召开,还颇有收益。此外,节日晚宴等传统的活动在很多地方仍然继续。^②更重要的是,尽管此时人们或许再无平日那么多休闲的心态,但恐慌和绝望却让很多人过上了更加疯狂的生活。“很多人逃离了瘟疫的深渊,却在相互的屠杀中丧命。”^③

全方位、多渠道的交往模式,为瘟疫在聚落之中近距离、多途径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不同人群在面对瘟疫时又往往有不同的反应,从而使得各自的聚落社会环境呈现出特殊性,这在教士阶层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教会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下的惩罚,所以要摆脱瘟疫的威胁,只有乞求上帝的原谅。故而教士“身先士卒”,积极组织各种集体性宗教活动。例如,在坎特伯雷教省,“各主教和其他属于司祭品级的人都要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弥撒和组织布道,同时还要在每个周三和周五组织游行,另外还要做其他虔诚赎罪的、谦恭而顺从的公务”^④。在埃克塞特主教区,举行仪式的时候,“一定要召集本市和郊区所有的僧侣参加”^⑤。教士还必须积极参与临终关怀和开辟墓地等行为。在上述活动中,教职人员总体而言是尽心尽力的,甚至连约克教省的代理大主教这样的教会高层人士,也在黑死病最猖狂的几个月中到处巡视,探望病人,鼓励健康人,为新的墓地祝圣。^⑥这也使得他们始终是与死神接触最密切的人。据贝内迪克托对10个主教区的受俸教士死亡率统计,教士的死亡率在46.5%左右^⑦,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30%—40%的死亡率^⑧。

教士积极参与聚落社会活动,因之大量死亡。而那些逃离当时聚落社会环境的人,受瘟疫的影响就较小。例如,牛津大学的学者和学生们在听闻瘟疫传来的消息后迅速逃离,因为他们并非当地的固定居民。据萨特尔(H. E. Salter)等人的研究,牛津大学的死亡率仅为5%。^⑨

教士的高死亡率与牛津大学的低死亡率表明,在聚落社会环境中,职业特点的影响不容忽视。

- ① 克里斯托弗·戴尔《十四世纪的劳动道德》(Christopher Dyer, “Work Ethic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詹姆斯·博思韦尔、P. J. P. 戈德堡、马克·阿莫诺《十四世纪英格兰的劳动问题》(James Bothwell, P. J. P. Goldberg, Mark Ormrod, *The Problem of Labour i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约克2000年版,第23页;梅维斯·E. 马泰《工作和休闲》(Mavis E. Mate, “Work and Leisure”),罗斯玛丽·霍罗克斯、马克·阿莫诺主编《英国社会史(1200—1500)》,第280—281页。
- ② E. 罗博《法勒姆百户区的黑死病》(E. Robo, “The Black Death in the Hundred of Farnham”),《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44卷,1929年第2期。
- ③ 雷丁的约翰《雷丁的约翰所记载的瘟疫》(John of Reading, “The Plague according to John of Reading”),罗斯玛丽·霍罗克斯编译《黑死病》,第74—75页。
- ④ 坎特伯雷基督教堂主教《祈祷的重要性》(The Prior of Christchurch of Canterbury, “The Importance of Prayer”),罗斯玛丽·霍罗克斯编译《黑死病》,第114页。
- ⑤ 埃克塞特总铎《埃克塞特的响应》(The Dean of Exeter, “The Response in Exeter”),罗斯玛丽·霍罗克斯编译《黑死病》,第115页。
- ⑥ 菲利普·齐格勒《黑死病》,第182页。
- ⑦ O. J. 贝内迪克托《黑死病完整史(1346—1353)》,第356页。
- ⑧ 吉姆·博尔顿《“混乱的世界”:作为经济和社会变革因素的瘟疫》(Jim Bolton, “‘The World Upside Down’: Plague as an Ag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马克·阿莫诺、菲利普·林德利主编《黑死病在英国(1348—1500年)》(Mark Ormrod and Philip Lindley eds.,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1348-1500*),保罗·沃特金斯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 ⑨ 威廉·J. 考特尼《黑死病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William J. Courtenay, “The Effect of the Black Death on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棱镜》(*Speculum*)第55卷,1980年第4期,第697页。

但人群的死亡率差异还体现在不同性别、年龄、体质之中。黑死病期间的不少编年史家认为,女性的抵抗力较差。^①拉齐则通过对伍斯特郡希尔斯欧文法院卷宗的梳理,发现黑死病中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②有学者通过尸体骨骼损伤检测等手段,认为黑死病对那些体弱多病者有偏向性。^③但从现代病理学上来说,人类对鼠疫菌普遍具有易感性,不存在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差别。^④贝内迪克托指出,这大概是因为儿童的玩耍习性使得其容易受到传染,而在无人照料时,他们又往往变得虚弱;女性特别是孕妇则更多的居住在房中,易受跳蚤的攻击;营养不良本身并不会加重黑死病的病情,相关人群死亡率较高,更多的是因为瘟疫导致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混乱,体弱者尤其是其中的穷人很可能遭受饥饿之苦因之丧命。^⑤这同样体现了聚落社会环境对瘟疫传播的重要影响。

三、黑死病传播的聚落性与地区性

在黑死病的传播中,聚落空间环境与聚落社会环境的影响并非彼此分离,而是相互联系的。城市聚落空间环境在瘟疫传播中作用明显,城市聚落社会环境同样不可被忽视。正如戴尔所言,城市是指任何一个居民从事多种非农业职业的地方,^⑥手工业和商业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并居住于此。据 1332 年的世俗赞助金档案可知,伦敦当时有上百种不同的职业。据 13 世纪末与 14 世纪初的自由民准入登记来看,温彻斯特和诺维奇都有 20—70 种职业,约克也达百种。即使是达拉姆这样的中等城市,尽管只是一个宗教中心,也有 50 种以上的行业。在具有浓郁农业特征的小城镇,分工也不少。例如,半农业小城林顿,1279 年时就有至少 15 种工匠;其他如海威科姆、泰姆和海沃斯等,也有 20 多种^⑦。这些人操持不同职业,彼此之间频繁进行商业与公共交往。小城镇一般一周开市一次,大城市甚至每天都开市。瘟疫在这种商贸交往密切的环境中显然如鱼得水。

聚落社会环境在瘟疫传播中作用的发挥,亦与相关的聚落空间环境不可分。如上文所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教士死亡率很高,而这种聚落社会环境的发挥,也离不开聚落空间环境的配合。修道院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修道院因其宗教活动和经济、政治活动的特殊性,往往成为一个聚居的

-
- ① S. N. 德威特《黑死病期间伦敦不同性别的死亡风险(1349—1530年)》(S. N. DeWitte, “The Effect of Sex on Risk of Mortality during the Black Death in London, A. D. 1349—1350”),《美国自然人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第 139 卷 2009 年第 2 期,第 222—234 页。
 - ② Z. 拉齐《中世纪教区的生存、婚姻和死亡:哈利苏文的经济、社会和人口》(Z. Razi, *Life, Marriage and Death in a Medieval Parish: Economy, Society and Demography in Halesowen 1270—1400*),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4 页。
 - ③ S. 德维特、J. 伍德《黑死病基于既有健康的选择性》(S. N. DeWitte, J. W. Wood, “Selectivity of the Black Death with Respect to Preexisting health”),《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第 105 卷 2008 年第 5 期,第 1436—1441 页。
 - ④ 唐家琪主编《自然疫源性疾病疾病》第 777 页。新近的研究也倾向于证明,营养不良、性别差异等对于黑死病传播的影响不大。戴维·赫利希《黑死病和西方的转变》(David Herlihy,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34 页;H. A. 沃尔德伦《万人坑对于古流行病学有特殊价值吗?》(H. A. Waldron, “Are Plague Pits of Particular use to Palaeoepidemiologist?”),《国际流行病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第 30 卷 2001 年版第 1 期,第 104—108 页。
 - ⑤ O. J. 贝内迪克托《黑死病完整史(1346—1353)》,第 350、352 页。
 - ⑥ 克里斯托弗·戴尔《转型时代?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经济和社会》(Christopher Dyer,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 页。
 - ⑦ 约翰·哈彻尔、马克·贝利《塑造中世纪: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理论》(John Hatcher and Mark Bailey, *Modelling the Middle Ages: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England's Economic Develop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1 页。

中心,更因其对病人的救护而在瘟疫爆发时具有特殊的参考意义。^① 修道院中设有救济所,身染疾病者抑或陷入困境的鳏寡孤独,甚至过往行人,皆可在其间获得救护;当黑死病流行时,更是不可计数的人蜂拥而至。^② 但修道院救济所中的空间环境不仅不能抵御,甚至还会助长瘟疫的传播。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救济所为例,病员大多安置在一个大厅之内,在过道两旁,床铺逐次排放,并无明显间隔;更严重的是,不管是病者还是其他寄宿者,往往共处此厅。^③ 如此一来,瘟疫不仅会在这些人中迅速流传开来,那些负责照料他们的教士也不可幸免。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之内50%—60%的成员,包括一些位高权重者,都居住在一个集体宿舍之中,即便有所谓的隔间,也仅仅是在两床之间拉一块布帘而已,这对于瘟疫的传播来说,阻碍作用几近于无。^④

聚落空间、社会环境在黑死病传播过程中的“相互配合”,使得黑死病的传播呈现明显的聚落性。一方面,黑死病的传播一般是以聚落为单位逐次完成的。由于交往频繁,瘟疫在某一聚落内部传播的速度极快,并可迅速流传至下一聚落。^⑤ 时人写道“没有哪一座城市、乡镇、小村庄甚至偏远之地的一些房屋可以幸免。”^⑥在这种情况下,瘟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传播到英国全境。另一方面,尽管瘟疫迅速向下一聚落流传,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聚落可逃离厄运。例如,在法纳姆百户区,瘟疫在1348年底爆发,1349年初即传向萨里等郡,但此地瘟疫的高峰一直延续到了1349年9月。^⑦ 贝内迪克托认为,“在每一所房子中,黑死病通常都会引起一场老鼠流行病,随后找不到老鼠宿主的鼠蚤就会转向与它们紧邻的人类;与交叉感染机制相比,这显然是一个颇为耗时的过程,并且房子越多,吞噬该地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⑧。

受这种聚落性传播的影响,黑死病死亡率还呈现地区性的差异。大致来说,英国低地带的死亡率要超过高地带。据统计,在受俸教士死亡率超过45%的11个郡中,其中属于低地带的有9个^⑨。其重要原因是,低地带的聚落密度较大,而高地带的聚落密度相对较小。低地带是英国境内光、热、水、土配合最好的地区,便于农业开发。^⑩ 受材料的限制,我们难以给出一个乡村聚落分布具体数字

① 黑死病期间修道院的死亡之惨烈被大量记载下来。例如,在莫城(Meaux)修道院,黑死病前有42个僧侣,但仅仅在1349年8月,就有22个僧侣死于瘟疫,其中包括院长休(Hugh)。当这一次瘟疫消逝的时候,这个修道院仅剩下了10个僧侣。拉塞尔对12个修道院的死亡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得出了44%的死亡率。P. G. 莫德《黑死病对英国修道院的影响》(P. G. Mode, *The Influence of the Black Death on the English Monasteries*),芝加哥大学未刊博士论文,1916年,第15页;芭芭拉·哈维、吉姆·厄彭《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发病模式:以维斯特敏斯特修道院为例》(Barbara Harvey and Jim Oepen, “Patterns of Morbid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A Sample from Westminster Abbe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54卷,2001年第2期,第222页;J. C. 拉塞尔《中世纪英国人口》(Josiah Cox Russell, *British Medieval Population*),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222—223页。

② 彼得·莫德《黑死病对英国修道院的影响》,第4、5、8页。

③ 芭芭拉·哈维、吉姆·厄彭《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发病模式:以维斯特敏斯特修道院为例》,第222页。

④ 芭芭拉·哈维、吉姆·厄彭《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发病模式:以维斯特敏斯特修道院为例》,第221—222页。

⑤ J. W. 伍德等《14世纪黑死病的时间动态:英国教会档案的新证据》(J. W. Wood et al.,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Fourteenth-Century Black Death: New Evidence from English Ecclesiastical Records”),《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第75卷,2003年版第4期,第427—448页。

⑥ 弗朗西斯·加斯凯《大瘟疫(1348—1349年)》(Francis Gasquet, *The Great Pestilence A. D. 1348 - 1349*),伦敦1893年版,第92页。

⑦ R. S. 戈特弗里德《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的自然和人类灾难》,第64页。

⑧ O. J. 贝内迪克托《黑死病完整史(1346—1353)》,第233页。

⑨ 苏珊·斯科特、克里斯托弗·邓肯《瘟疫的生物学:历史人口统计的证据》(Susan Scott and Christopher J.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⑩ 曾尊固《英国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8—59页。

的对比,但无论是从领地还是公地,耕地抑或牧场,两圃区抑或三圃区的分布密度来看,低地带都远高于高地带。与此相适应,与聚落密切相关的一些数值,如文献所体现出来的菜园、果园、葡萄园、小农场和宅地的价值,核心耕地的分布、播种的密度,税收的额度等,以及更直接的庄园法庭、小村庄、十户联保区以及磨坊的分布密度来看,低地带也要比高地带高得多。^① 城市和修道院的分布也体现了这一点,^②从 1334 年世俗补助金的征收看来,不管是城市数量,还是单个城市的税额,低地带都要超过高地带。^③ 莫德亦认为,修道院大量集中在英国的南部、中部和东南方。^④

根据德国学者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理论,不同的聚落还按照一定的经济关系,以一个核心地为中心连为一片。^⑤ 这提示我们,在考察瘟疫传播的地区性时,不仅要关注单个的聚落环境,还要对聚落间环境给予一定的重视。同样主要位于低地带,东南沿海地区的死亡率要就超过了中西部地区。1377 年人口税册显示,东南沿海三郡大概有 94 531 人,仅约为 1300 年人口数字的 31%;而中西部七郡,这一比例约为 61%^⑥。阿克曼认为,东南沿海三郡属于实行闭田制(closed-field system)的林地带(woodland),在这里,田地狭小,常常隔以沟渠和土墙。林地带的人们彼此分开居住,不易沟通。中西部七郡属于实行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的沃田带(champion ground),其风貌恰与林地带相对,土地开阔,往往以条田状分布,施行三圃制或二圃制,人们的居住也较为集中。从表面来看,沃田带人口密集,聚居空间较为集中,适合家鼠的繁衍,但开阔的条田阻碍了家鼠在村庄间的流窜,瘟疫的传播也会受到影响。林地带的聚落呈现出四散而居的格局,村庄之间距离较近,反而便于家鼠的流动,瘟疫的肆虐也就更为严重了。^⑦ 这种聚落间环境的差异,也提醒我们在考察瘟疫肆虐的问题时,还需要对瘟疫的长距离传播机制,以及人们的医疗救济反应加以重视,对此,我们将另文专论。

结 论

如上文所论,聚落环境对于黑死病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聚落空间环境为鼠、蚤、人的紧密共存创造了条件,聚落社会环境则使得黑死病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这两者还相互联系,依据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对黑死病的传播造成影响。聚落环境不同,瘟疫造成的影响也就不同,正因为如此,黑死病的传播具有聚落性的特点,并在全国表现出地区性的差异。

-
- ① 布鲁斯·坎贝尔、肯·巴特利《黑死病之前的英格兰:领主、土地和财富图示集(1300—1349年)》(Bruce Campbell and Ken Bartley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Black Death: An Atlas of Lay Lordship, Land and Wealth, 1300 - 1349*),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7、60、64、92、93、95、96、109、135、136、194、248、249、270、276 页。
 - ② H. C. 达比主编《1600 年前英格兰新历史地理》(H. C. Darby ed. *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1600*),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96 页。
 - ③ H. C. 达比主编《1600 年前英格兰新历史地理》,第 180—182 页;R. H. 布里特纳尔《英国城市经济(1300—1540 年)》(R. H. Britnell *The Economy of British Towns, 1300 - 1540*),D. F. 帕利泽主编《剑桥英国城市史(600—1540 年)》(D. F. Palliser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600 - 1540*)第 1 卷,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9 页。
 - ④ 彼得·莫德《黑死病对英国修道院的影响》,第 3 页。
 - ⑤ 克里斯托弗·戴尔《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市场城镇和乡村》(Christopher Dyer, "Market Towns and the Countrysid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加拿大历史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 31 卷,1996 年第 2 期,第 17—35 页。
 - ⑥ 东南沿海三郡,即埃塞克斯郡、米德尔塞克斯郡以及苏塞克斯郡,中西部七郡,即汉普郡、林肯郡、南安普顿郡、诺丁汉郡、牛津郡、沃里克郡以及威尔特郡。查尔斯·阿克曼《中世纪英格兰的乡村人口》(Charles Ackerman, "The Rural Demography of Medieval England"),《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第 23 卷,1976 年第 2 期,第 110、112 页。
 - ⑦ 查尔斯·阿克曼《中世纪英格兰的乡村人口》,第 107 页。

但我们还要注意,黑死病以及其他瘟疫的肆虐,亦会刺激人类改变聚落环境,并最终对瘟疫的肆虐产生影响。14世纪的黑死病是鼠疫在欧洲肆虐的顶峰,之后几百年内鼠疫反复发作,但烈度均较14世纪为差。1665年的伦敦大疫之后,鼠疫在欧洲渐趋消失。对于欧洲鼠疫减弱乃至消逝的原因,我们当然要清楚这与病原体或宿主的变异,抑或人类卫生水平的提高或许关系更大;^①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类围绕聚落环境所做出的努力。14世纪以后,英国居民的居住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不同功能的建筑物特征越来越突出,单、双层多房间住房出现,私人空间受到了重视;^②各级权力机构也不断颁布法律,对公共卫生环境加以治理。^③当然,英国的聚落环境并未因此发生实质性的改变。^④正是伴随着这些努力,整个社会的聚落环境意识不断增强。人们认识到了聚落环境在瘟疫传播中的作用,并努力通过卫生检疫、人群隔离等方式规避瘟疫,应对灾难,从而在与鼠疫的斗争中渐渐占据了上风。^⑤

如此看来,在历史进程中,瘟疫的肆虐并非完全的“随心所欲”。实际上,无论是聚落空间环境,还是聚落社会环境,都是人类面对特定自然和社会条件所创造的一种生存环境。瘟疫可以依托聚落环境而肆虐,亦可随着这种聚落环境的改善而受到控制。在这背后,则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

[本文作者李化成,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国洪更)

-
- ① 安德鲁·B.阿普尔比《瘟疫的消逝:一个持续的困惑》(Andrew B. Appleby, "The Disappearance of Plague: A Continuing Puzzle"),《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33卷,1980年第2期,第161—173页。
 - ② 王向梅《从居住角度看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私人生活的变迁》,《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郭华《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居住状况的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 ③ 谢谦《鼠疫困扰下的伦敦——近代早期城市生活管窥》,《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1期;程杰晟《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西欧的环境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第35、61—64页。
 - ④ 聚落环境明显好转发生在19世纪,是随着工业化的逐渐完成而实现的。任其悻、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 ⑤ 向荣《集体行动与近代早期西欧鼠疫的消失》,《光明日报》2003年7月1日。

Li Huacheng *The Local Environment of Settlements and the Spread of the Black Death in the 14th Century England*

The Black Death devastated the whole England in the 14th century. The mode of its sprea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of settlements. For instance,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of settlements facilitated the coexistence of rat, flea and human, whil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settlements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the plague. Both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worked together and finally influenced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ocial and natural conditions. However, both the environments were created in specific natur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by the human beings. As a result, epidemics could not only be controlled but also be aggravated by the environments.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pestilence was a reflex of the untiring efforts of human beings to get upper hand over the plagues.

Shi Qingbo *Greek Polis: Stateless Societies? A Debate about the Statehood of Ancient Greek Poleis*

According to Moshe Berent, because of lack of public coercive apparatu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lasses and government, which were considered essential in traditional state theory, most ancient Greek poleis were stateless societies rather than states. His argument was criticized by M. H. Hansen, Leonid E. Grinin and E. C. L. van der Vliet. They all suggested that most poleis were early democratic states or citizens-states, because the institutions of polis were sophisticated and efficient, the judicial system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were more prominent. This debate about statehood reflects some diverge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 in classical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respectively.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ans have too often assumed that people live outside the natural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challenges that assumption and insists that humans are part of nature, and that we have an impact on nature and nature has an impact on us. This new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ree interacting sets of changes: changes in the earth's systems (climate, geology, ecosystems) over time, changes in the modes of producing a livelihood from those systems, and changes in cultural attitudes and their expression in arts, ideology, science, and politics. This new history is interdisciplinary in its methods and transnational in its implications.